

韩复榘何以禁毒不力? 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大毒贩, 他的老婆纪干卿、高级侦探队长刘耀庭、秘书长张绍棠、手枪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吴化文等无不公开吸食毒品。1937年, 韩复榘撤离济南前, 还自绥远运来大批烟土, 强派给了各商号。

60年前, 济南掀起禁毒风暴

田可新 房媛娟

毒品, 毒瘤。百余年前, 西方列强正是用它和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掠夺这里亿万人民宝贵的家产财富, 戕害他们曾经强健的体魄, 让近代中国的历史增添了多少血泪。而血泪中, 中国人也在不断“戒毒”。1839年自虎门卷起的滚滚硝烟, 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更化作万钧雷霆, 大战烟毒。省城济南在1952年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 声势浩大的斗争, 基本禁绝了为害百余年的烟毒。

“毒”从哪里来

1842年鸦片战争后, 帝国主义国家公开大量地向中国输入鸦片, 烟毒逐渐蔓延开来, 成为军阀政客们的“心头好”。清朝末年, 鸦片便已经在省城公开流行。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 承袭德国胶济路的权力后, 更派遣大批特务间谍人员冒充商人来济, 以开设洋行等为掩护, 大量贩卖毒品, 并利用吸毒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因此, “挂羊头卖狗肉”者着实不少——所谓的文明公司、吉祥公司、安原大药房等, 公开制卖海洛因; 金水旅馆则招徕高级日特奸细和流氓头子, 籍吸食毒品之名, 从事间谍活动; 马场吴服店则以毒品为诱饵, 召集外县土匪首领, 并供给以武器弹药, 制造匪乱……“七七事变”后, 烟毒更加泛滥, 公开的大烟馆就有百余家。

济南的烟毒从哪里来?

“烟”, 即鸦片, 又叫做罂粟, 别名福寿膏、芙蓉蓉。济南的“烟”, 有以当时热察绥为主要产区, 以京津为集散地的北路货; 有以亳州、宿县、永城等地为产区, 以商丘、徐州为集散地的南路货; 有以博兴、广饶、桓台、寿光一带为产区的东路货; 还有产于历城的南山区和泰安的朱店庄一带的南山货。其中, 南路、东路鸦片的销量较大, 而吸食者多是工商资本家、土豪劣绅和军阀官僚家庭的子弟以及一些恶棍流氓等。

在这些烟民眼中, 吸“毒”是“下等人”的嗜好。毒, 即毒品, 是鸦片的代用品。海洛因(又称白面、白粉)、白丸、紫金丹、红丸、快上快算作“吸食类”, 解放后俗名“翁倒山”的海洛因销量最好。在济南, 吸食者多散布在流氓游民阶层,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吸烟毒而导致破产的人; 还有将海洛因、吗啡、加太因、巴比那妥、海洛断瘾等麻醉剂注入肌体的注射类毒品, 其在敌伪时期极为盛行, 主要由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传播, 而西药房也供给毒贩原料, 经营销售或自制麻醉药, 还有少数小药房或诊所直接兼贩毒品或注射吗啡。

“毒祸”猖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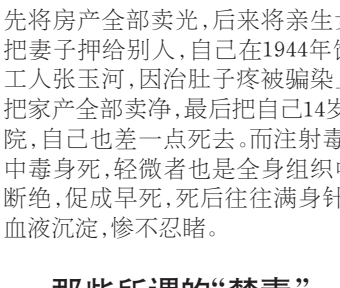
大毒犯张继武, 曾住在南上山街27号, 日军侵占济南期间, 充任日特直接掌握的济南土膏公会会长兼营信诚土膏店, 专门勾结日本宪兵特务杨鸿顺、杨子祥, 伪“禁烟局”局长李宗翰等, 大批贩卖烟毒, 攫取暴利。解放后, 继续网罗惯犯何省三、刘锡泉、房蒲庭等19人结成贩毒集团, 从1949年春, 就在西安、徐州、上海等地设立货站, 商店等掩护其有组织的贩毒制毒的活动。短短3年时间, 该集团共制造和贩运烟土1万余两, 海洛因1800余两, 吗啡300余支。

郭志武, 日伪时期收罗地痞流氓2000余人, 形成集团式贩卖毒品, 并令其徒弟帮他贩卖毒品。1949年, 指使其妻去梁山, 一次贩运大烟200多两, 1950年春该集团又去商丘买烟土400余两, 到西安销售。他们以开大金台旅社为名, 在西安、济宁、商丘等地暗设联络点。1949年至1950年运往周村销售的毒品达200余两以上。

天生药房经理赵长增, 解放前就专以制造吗啡和其他带毒素的麻醉剂毒害人民。解放后, 仍与其妻等在辛庄村用机器制毒, 供给某些私营药房进行推销。

烟毒之害, 害人不少。郊区东红庙庄有个孙景之, 1939年为了治病被骗吸食“大烟”成瘾后,

右: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济南。
下一: 当年的禁毒宣传材料。
下二: 缴获的毒品。
下三: 韩复榘。



那些所谓的“禁毒”

军阀韩复榘在济南时, 也曾慑于民愤下令禁烟禁烟, 办法是第一次查获后送戒毒所戒, 然后在脸上刺字释放, 二次查获后即行枪毙。但在韩复榘的戒毒所, 毒贩的下场却也是“两重天”。有钱的能住在“优待室”, 从纸烟内夹带毒品照样吸食, 再以“保外就医”为由提前释放, 避免刺字; 没钱的就被抛在一边不问不理, 许多人被折磨致死。而那时, 毒品全为日本人所控制, 鸦片的流传获日方支持, 韩复榘并不敢过问。有钱人可安住在洋行内吸食, 或由日本保送送货上门, 烟贩即便被捕, 甚至只要掏30元就能被释放。

韩复榘何以禁毒不力? 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大毒贩, 他的老婆纪干卿, 高级侦探队长刘耀庭, 秘书长张绍棠, 手枪旅长兼济南警备司令吴化文等无不公开吸食毒品。1937年, 韩复榘撤离济南前, 还自绥远运来大批烟土, 强派给了各商号。

日本人也进行所谓的“禁毒”。他们设立禁烟分局, 下设戒烟社数十家, 责令对全市吸毒分子登记, 规定限制每人每月吸食量, 说是“先允许吸食, 规定数量按期递减, 逐渐戒绝”, 这掩耳盗铃



的法子很快“见了成效”, 染上毒瘾的人越来越多。随后, 日寇大张旗鼓地将戒烟社改为了土膏店, 下令在历城、泰安、济宁等地栽种鸦片, 还成立了土膏业公会加强领导……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于1946年春开始禁毒。但当时的警察局长林凤楼开办了两处戒烟医院, 自院长、主任至院警、夫役, 上下连成一气, 大做烟民的生意, 戒烟医院变为公开的大烟馆。国民党也捉了几回烟毒犯, 却只是一些零星的小贩和吸食, 个别有钱的人即便有几个被捉坐狱的, 在狱中可照常吸食。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内, 烟毒活动依然猖獗。

大打人民禁毒战争

1948年济南解放后, 党和政府多次明令禁烟禁毒, 并采取各种措施, 对制造、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实行短期劳动改造。到了1952年初, 济南市共打击处理烟毒案件580余起, 1150余犯, 缴获鸦片、海洛因1232两, 有力地遏止了毒品的流行和蔓延。但是, 由于毒品的危害历史久远, 遗害深重, 毒害仍未得到彻底根除。

为此, 1952年5月, 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先后发出禁毒的决定和指示。在济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 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禁烟运动。5月底, 中共济南市委组织成立了由公安、司法、民政、卫生、税务、宣传及工、青、妇等部门参加的禁毒委员会, 并以公安局为主, 成立禁烟办公室。他们从清理旧档案, 重申在押毒贩以及整理相关材料入手, 清出毒犯线索988份, 并对重大的制贩集团组织专案侦察, 集中力量重点调查, 经约两个月的紧张调查, 至运动开始时, 共掌握有活动的毒犯材料311份, 并据此提出毒犯名单。1952年8月12日, 济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届协商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召开, 作出关于开展禁烟运动的决议, 当晚便开展行动, 首次逮捕了一批毒犯。

12日晚, 审讯即开始。起初, 毒犯除个别低头认供外, 一般则避重就轻, 企图蒙混过关。办案人员采取了分别审讯与集体教育的办法, 指明毒品的危害及其罪恶的严重, 重申政府除毒务尽的决心, 这令毒犯均供认不讳, 有的供供材料是政府掌握的一倍或数倍以上。与此同时, 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的宣传也广泛开展起来, 广大群众都表示“无比的拥护”, 将政策视为在“挖根”, 认为“制

毒、贩毒就是根, 根不去, 毒就不能禁”。短短几天, 就陆续接到群众口头或书面的检举毒犯材料159份, 其中检举制毒者2人, 贩运毒品者20人, 贩卖毒品者136人, 窝毒者1人, 仅济南市公安局四分局8月18日一天即接到检举材料60份。而9月7日召开的万人宣判大会, 处理了11名, 其中处死1人, 对一批坦白好, 情节较轻的登记毒犯宽大处理, 对75名拒不坦白、情节严重的当场予以逮捕, 对所有毒犯限期7天彻底坦白, 缴出毒品, 更是对毒犯施以了强大的压力, 推高了群众参与禁毒的热情, 打开了缴获毒品的困难局面, 使查毒犯、追毒品运动进入了高潮。1952年11月5日, 济南市召开近万人参加的全面处理毒犯宣判大会, 对17名毒犯进行宣判, 并当众销毁一批毒品, 然后又分区召开宣判大会, 到11月8日, 已捕毒犯全部宣判完毕。

此次禁毒过程中, 十分讲求工作的方式方法。在“严厉惩办与教育改造相结合”“打击惩办少数, 教育改造多数”“彻底坦白者从宽, 拒不坦白者从严”方针的指导下, 济南市对于少数罪大恶极的制毒、贩毒的惯犯, 贩毒集团的首要, 屡教不改而贩毒数量巨大的大毒犯, 以及在禁烟运动中仍在进行制毒、贩毒活动的现行犯, 予以从严法办; 对于制毒、贩毒数量较小的惯犯, 根据其坦白悔改的程度进行处理; 对于一般的小量贩毒犯以及从犯、偶犯, 采取登记的办法, 进行批评教育, 具结悔过, 不捕不罚, 这让打击、震慑、感化、警示的作用立刻显现了出来; 而须遵守的纪律也十分明确: 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厂店住房检查毒品, 检查毒品毒具者必须持有公安局的检查证; 任何人均有检查毒犯之责, 但无直接处理之权; 严防逼供诱供、刑讯及变相刑讯; 所有毒品毒具, 一律交公安局, 不得匿报扣留, 违者以违法论处, 这也让工作开展得有理、有力、有序, 让人信服。

自1952年的5月至11月, 此次禁毒运动历时共6个月。半年时间, 济南的禁毒工作取得了重大胜利。其间, 共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13693份, 逮捕毒犯218名; 缴获烟土、烟膏、海洛因等各种毒品3250余两和吗啡针、片、面以及其他毒品一宗, 缴获烟具、毒具2138件; 对吸食毒品的人进行了劝戒、教育、改造, 打下了彻底根绝毒品的基础。种、制、贩、吸这一毒品链条的各个环节均被较彻底地斩碎。从此, 烟毒的阴霾便在省城散去, 而这也为济南的发展建设创造了一个更良好的环境。(图片提供: 济南市档案馆)

山海经

八仙过海

陈文念

家喻户晓, 脍炙人口的八仙过海的传说发源地并流传于蓬莱。

这天, 八仙兴高采烈地来到蓬莱阁上聚会饮酒。八仙每人准备一道菜, 以当地的大虾、海参、扇贝、海蟹、红螺、真鲷等海珍品为主要原料, 加工了8个拼盘、8个热菜和1个热汤。拼盘各自用自己的宝物拼成图案, 造形生动别致, 盘盘都有神话典故, 不仅味道鲜美, 还可观赏助兴; 热菜烹饪更为精致, 呈现蓬莱多处名胜景观, 巧夺天工; 热汤以八种海鲜加鸡汤制成, 味道鲜美奇特。酒至酣时, 铁拐李意犹未尽, 对众仙说: “都说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景致秀丽, 我等何不去游玩, 观赏?” 众仙激情四溢, 齐声附和。吕洞宾说: “我等既为仙人, 今番渡海不得乘舟, 只凭个人道法, 意下如何?” 众仙听了, 欣然赞同, 一齐弃座起身而去。

八仙人聚到海边, 个个亮出了自己的法宝。逍遥闲散的汉钟离, 把手中的芭蕉扇甩开扔到大海里, 那扇子大如蒲席, 他醉眼惺忪地跳到碧波荡漾的扇子上, 悠悠游哉地向大海深处漂去。清婉动人的何仙姑步其后尘, 将荷花往海里一放, 顿时红光四射, 花像磨盘, 仙姑亭亭玉立于荷花中间, 风姿迷人。众仙谁也不甘落后。吟诗行侠的吕洞宾, 倒骑毛驴的张果老、隐迹修道的曹国舅、振靴踏歌的蓝采和、巧夺天化的韩湘子、借尸还魂的铁拐李纷纷将宝物扔入海中。瞬间, 百舸争流, 各显神通, 道雄镇海, 悠然地遨游在万顷碧波之中。

八仙过海, 顿时海面如翻江倒海, 滔天巨浪震动了东海龙王的宫殿。东海龙王急派虾兵蟹将出海查巡, 方知是八仙各显其能, 兴海所为。东海龙王恼羞成怒, 率兵出来干涉。八仙据理力争, 与之抗辩, 东海龙王下令虾兵蟹将抢走蓝采和。蓝采和不甘示弱, 与之争斗, 终因寡不敌众, 被抓进关进龙宫。众仙见状大怒, 个个奋勇上前厮杀, 在海里打起一场恶战。众仙连斩东海龙王两个龙子, 吓得虾兵蟹将魂飞魄散, 屁滚尿流, 纷纷败下阵来。

东海龙王怒不可遏, 急忙请来南海、北海、西海龙王, 不制服众仙誓不罢休。于是四海龙王催动三江五湖四海之水掀起惊天巨浪, 杀气腾腾地直奔众仙而来。正在一触即发之际, 忽见金光闪烁, 浪中闪出一条路来, 原来曹国舅白扳板天生具有避水神力, 他怀抱扳板在前开路, 众仙在后紧紧跟随, 任凭巨浪排山倒海, 却奈何不了他们。四海龙王见此情景, 十分恼火, 又调动了四海兵将准备再战。恰巧南海观音从此处经过, 便喝住双方, 出面制止, 使双方和好如初, 东海龙王放出蓝采和。八仙拜别观音, 各持宝物, 乘风破浪, 遨游而去……

八仙到何处去了? 有的说东渡日本, 有的说到对面的长岛安营扎寨……

其实, “长岛庙岛, 古称沙门岛, 从乾隆三年起, 驻守在内地和边关的军人触犯了刑律, 都要被发配到沙门岛。岛上犯人越来越多, 而朝廷一年只拨给300人的口粮。于是, 沙门岛的看守头目李庆便想了个办法。当犯人超过300人时, 便将老弱病残者捆住手脚, 扔进大海, 使岛上的人始终保持在300人以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十多名犯人趁隙逃跑, 各自抱着木板、竹篙、驴皮筏子、葫芦、木盆之类的工具, 泅渡过海, 向对岸的蓬莱方向游去。从沙门岛到蓬莱有15公里之遥, 浪高流急, 途中半数因体力不济被大海吞噬, 最后只有8人上岸, 被当地渔民发现后, 为避免追捕, 8人将自己附会成道教传说中的上八洞神仙, 自蓬莱三岛漂洋过海, 云游至此。8名犯人最终幸免于难, 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也就流传开了。”

八仙象征着人们崇尚正义、向往自由的天性, 千百年来, 八仙的性格已凝练成蓬莱精神, 八仙文化已沉淀成蓬莱地域文化的精髓。

责任编辑 于岸青

嶙古碑跌夙负, 治水伟业成传奇; 撰文书丹非等闲, 高士大家总相惜。矗立于大汶河南岸宁阳县禹王庙内的《堽城堰记》碑, 为明代所立, 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该碑主要是为铭记重修堽城堰的来龙去脉而立, 其上铭文由当朝大学士商辂撰写, “吴门四家”之一的文徵明之师李应祜书丹, 其史料、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甚高。

治水千秋事 尽在碑上铭

《堽城堰记》碑铭刻的就是明代治水的经典之举。

碑文先记述了治水的历史背景: “汶泗二水, 齐鲁名川。汶出济南莱芜县, 泗出兖州泗水县, 二水分流, 南北不相通。自古舟楫浮于汶者, 自究北而止; 浮于泗者, 自究南而止。元时, 南方贡赋之来, 至济宁舍舟, 陆行数百里, 由卫水入都。至元二十年, 始自济宁开渠抵安民山, 引舟入济, 陆行二百里抵临清, 入卫。二十六年, 复自安民山开渠至临清。乃于兖东筑金口堰, 障泗水西南流, 由济河注济宁; 究北筑堽城堰, 障汶水南流, 由汶河注济宁; 汶下流, 又筑戴村堰, 障之西南流, 南抵济宁, 北抵临清, 而汶泗二水悉归漕渠。于是舟楫往来无阻, 因名之曰会通河。”

“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 无事漕运, 向之河堰废坏殆尽。太宗文皇帝迁都于北, 爰命大臣相视旧规, 筑堰疏渠, 漕运复通。第堰皆土筑, 每遇淋漓冲决, 水尽泄, 漕渠尽涸, 随筑随决, 岁以为常, 民甚苦之。”

海岱一方

《堽城堰记》诉说明朝治水事

周东升



而后详述重修堽城堰全过程: “明年春三月, 命工淘沙, 凿底石如掌平。底之上, 筑石七级, 每级上缩八寸, 高十有一尺, 中置巨, 细石, 煮秫米为糜, 和灰以固之。底广二十五尺, 面用石板叠二层, 广一十七尺, 表一千二百尺。开甃口七, 各广十尺, 高十一尺, 置木板启闭。

山东有三坝 一人修了俩

金口坝、堽城堰和戴村坝被誉为我省水利史上的三大水利科技工程。除戴村坝为明永乐九年始修外, 其它两项均为元代所修, 明代重修。而根据《堽城堰记》碑记载, 明代重修两项的功臣巨擘, 竟系同一人所为, 他就是张克谦。

张克谦, 名盛, 今江苏省宜兴市人。明天顺四年中进士, 成化年间由工部主事改任都水司。其任职期间, 凡有益漕运之事, 皆悉心料理, 倾力而为, 在古籍及民间皆留有其治水的许多佳话。

元宪宗七年始筑堽城堰遏大汶河水南流, 由汶河注入济宁, 以利漕运。因坝为土筑, 汛期常被冲毁, 且淤积泥沙, 河床升高, 汶河塞流。明太祖定都南京后, 漕运停止, 河道逐渐淤塞, 坝堰毁坏。明成祖初年, 迁都北京, 恢复航运; 继而极其详尽地记述了张盛在堽城堰重修过程中的选址、用工、用料及施工工艺等。

文中还非常明确地提到, “(张克谦) 督夫采石, 首修金口堰, 不数月告成。”由此推断, 金口坝、堽城堰均为张盛所修。如此浩繁工程, 张克谦独建其功。其事在明万历二十四年修《兖州府志》中可得佐证: 元仁宗延祐四年, (金口坝) 疏为二洞, 装置闸门, 视季节水势而启闭, 自此定名为“金口坝”。明成化七年, 都水主事张克谦结庐督修此坝, 历时九月, 工竣坝在。计东西长50丈, 下阔3.6丈, 上阔2.8丈, 高7尺。两端建雁翅以杀水势。南北跌水直五尺, 广40丈, 用石3万余块, 木

桩8万余根, 石灰百万斛。坝身固以铁扣, 嵌缝拌之以糯米, 成为鲁地著名的“金口玉坝”。明嘉靖三十七年再修, 将坝身加长增高, 扩为五洞泄水。金口坝宏伟坚固, 横跨泗河, 宛如卧波长虹。至此可以断定, 金口坝、堽城堰的重修确系张盛一人领衔建功立业无疑。他也因此而名声大震, 此后平步青云, 累官左参政。

撰文和书丹 二人非等闲

《堽城堰记》碑的文学和书法艺术价值也闪耀着先贤名士的光辉。

奉朝廷之命, 应钱源之邀, 文坛翘楚商辂慨然命笔。商辂乃浙江淳安人, 号宗朝, 殿试皆第一, 明代首辅, 仕英宗、代宗、宪宗三朝。商辂横溢文采在《堽城堰记》碑文中一览无余。虽长达1300余字, 但字字珠玑, 气韵流畅, 其谋篇之精妙, 笔法之高超, 实为碑文中之典范。

书丹者李应祜为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代著名书法家, 他学欧阳洵, 颜真卿, 深得蔡襄用笔之法, 其篆、楷尤为世人称最道奇, 评为国朝第一。明成化二十二年, 17岁的文徵明拜于李应祜门下, 终成一代书法大师。

遍览全碑, 碑首篆书“造冈(堽)城石堰记”; 碑文楷书, 法度严谨, 笔法老辣, 清丽脱俗。用笔横向取势的撇、捺、横, 竖生劲大方, 纵向布局的大、小、开、合变化自然, 章法稳妥中见奇崛, 行笔疾缓中藏风骨, 使人感到飘逸之中蕴沉着, 不愧为大家之风范。